

北海文史

第十四辑

曲艺 史话

北海市曲种分述

老杨公

老杨公，是一种用廉州方言演唱的民间歌舞，流行于北海、合浦以及浦北一带说廉州方言的地区。据说形成于明代末年。

民间歌舞老杨公，是民间曲艺的一种。它表现了一个反封建的主题，反映了一个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蔡九仙姑因动了凡心，被玉皇罚她下凡，降生在穷苦的农民家中。适遇荒年，农作物失收，被地主拉去顶租为婢。她受尽了地主的凌辱和虐待，同时，斩柴时相恋的情人又被地主迫走他乡。蔡九仙姑在封建社会的束缚下看不到出路，感到无限的愁苦和绝望，欲投江寻短。适遇南海观音化身的老杨公撑船驾到，救她脱离苦海，并指点迷津让她与情人相会。

老杨公这种曲种，一般由男女两人演唱，边歌边舞。男的扮老梢公，女的扮想投江的仙姑，而老梢公却用山歌(即西海歌)来与仙姑对答，这样便引起一场引人入胜的对歌。许多歌手都帮仙姑用山歌来难倒梢公。对歌往往相持几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

1952年北海市委组织编写的《北海历史》一文，在风俗习惯一章中也提到“老杨公”：“老杨公——是结婚时脱六宗六祖的契。这习惯在廉北最普遍，深入民间，农村就极之流传。每当嫁娶时(指男的)有很多是做老杨公的。这时，道巫中熟习歌唱的或专事歌唱的歌者(俗称太保)，扮一个叫太保(传说是观音的化身)唱民间歌谣，内容利用双关相连的语句，含意深长，感情浓厚，拿一拐杖当作船槽状，且燃纸条一明一暗，手动脚乱随唱、随舞。另外一个扮装烧艳的叫何仙姑，妖气十足，与太保两人唱歌对答，有四个道巫专事诵经化塔(诵观音经烧纸塔)，又要二个童男女伴诵。当太保在唱歌，旁人可随便唱歌对答，互相比赛，唱赢了就叫当老杨公，剧烈时往往唱通宵，旁观的也很高兴。”

由此可见，建国前的“老杨公”是一种从属于道教活动，歌舞交融的说唱艺术。在表演中，老杨公和仙姑互以俚歌酬唱。这些民间歌谣，通俗易懂，活泼清新。有的含蓄双关，有的借物喻情，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建国后，这种说唱形式有了新的发展。改编或用老杨公曲调新编演的老杨公，在表演上，由传统的“唱、白、做、舞”相结合的表演方式，向“唱、白、做”的表演方式演变，逐渐淡化了舞蹈的表演动作。在内容上，扬弃了庸俗的唱词，加进了反封建的或富有时代气息的内容。在演员的服饰及音乐伴奏方面，建国前演员由穿着道袍、戴着面具的道士饰演，伴奏方面只有扁金鼓、大锣等少量乐器。建国后，道士已不再介入演出，多由业余文艺队的演员饰演，服饰方面既有古装的，也有时装的和现代的。音乐伴奏也增加了乐器，丝竹锣鼓俱全。在演出动机及演出场所方面，建国前是“娶妇家”为了消灾迎福而在家门口演出。建国后，是为了娱乐、宣传而在公共舞台上演出。

1953年，由北海民间艺人顾少英、苏道熙、黄斌瑞以及文联干部李楚金改编的老杨公率先获得成功，当年春参加广西省首届民间文艺观摩会演时获节目优秀奖，演员顾少英、苏道熙获个人优秀奖。不久，该节目还被广西省选去参加中南区音乐舞蹈汇报演出。

后来，各地业余剧团和文艺演出队也用老杨公的曲调配合宣传婚姻法、农业生产、计划生育等中心工作而编演了不少内容各异的说唱节目。例如，50年代合浦石康镇剧团曾编演了受群众欢迎的老杨公《余唯利》，常乐镇十二区人民剧团曾由艺人卢统与周易初、蔡昭奇等合作改编了老杨公《两兄弟》，此节目曾参加1955年的合浦专区文艺汇演，获得奖励。1956年，经顾少英，苏光瑞，温耀贵等人加工改编的老杨公曾参加广东省业余文艺会演，并获优秀演出奖。1959年合浦西场镇剧团编演的老杨公《扔酒壶》，由邹朝波主演，曾参加广东省湛江专区农民业余汇演，获得好评。1964年，北海职工业余乐团演出了由北海中学吴廷贯老师编的老杨公《咁样姑娘太丑样》。1966年，合浦县农村文化工作队参加钦州地区乌兰牧骑会演，演出了由周易初(合浦文化局)改编的老杨公《借牛》，也获好评。1979年，由北海市文工团编演的老杨公《我们的解放军真好样》，曾参加广西区慰问团到自卫还击前线演出，用普通话演唱。1981年，由合浦县石康镇太平小学庞绍荣和县文化馆杨颂仁合作的老杨公《扮媳妇》，参加钦州地区

业余文艺会演，获创作奖和演出奖。同年，又参加广西业余戏剧、曲艺会演，获创作三等奖。1982年由庞绍荣，周易初合作编的老杨公《卖粮》，参加钦州地区的剧本评奖、也获创作奖。以上这些以老杨公曲调编演的民间说唱，既弘扬和发展了民间艺术老杨公，又推动了党的中心工作。

到八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结构和欣赏习惯的变异，老杨公调的说唱艺术在文化艺苑中逐渐凋落，以此编演的曲艺节目逐年减少。

耍花楼

耍花楼是珠乡的传统曲种。又名洒花楼和耍风流。流行于北海和合浦县的廉州、环城、沙岗、石康、西场、党江等乡镇。演唱时载歌载舞，用“鸭屎正”和廉州话演唱。也有用廉州话、粤语和客家话混合来唱的。

1958年编的《北海民间艺术史》载：“据一些老艺人说：耍花楼在北海流行了几百年的时间，通常以神话的表现形式出现，富有豪幻、风趣的特色和风格。……是北海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据《中国曲艺志编辑手册》所列的“中国现代曲艺曲种表”载，耍花楼形成于古代。传统的耍花楼，原是民间祭神、驱邪的迷信仪式，也称跳六害。是有病人家聘请道公佬为辟邪消灾而演的。

据老艺人说，建国前合浦县道公佬有佛教、道教、闾山教、茅山教等四大派系。耍花楼这种“跳鬼”迷信形式是属于茅山教的。

耍花楼有小耍和大耍两种。小耍表演是由两个锣鼓手配合一个茅山教的道士把一本“六害科”喃完毕就算了。大耍表演则象戏剧一样，有情节、有各种角色、有唱词道白，还有歌舞等动作。

二十世纪以后，传统耍花楼受粤剧的影响，不但配乐方面运用一套粤剧锣鼓和二胡、三弦、喉管等民族乐器，在内容情节方面，也运用粤剧的形式，在表演时往往在前头加上一段戏：某人(假设是女主人)在家无事，吩咐长工在家看屋，即与使婆、r环出外游玩。因她运气不佳，在途中冲着六郎鬼，回家时一口阴风吹来，她便昏迷得病，延医服药也不愈。占卜说是冲着五鬼六害，须用花楼真容和三牲六牲来酬神才得病愈。后来，只得去请道士来跳鬼酬神。道士出坛造楼，三声号角召出王母、九郎、洒楼捉鬼……

建国后，这种迷信的演出被政府取缔。但是，耍花楼这种曲种却为地方艺

人所改编，取其热烈风趣的表演艺术，注入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容而继续演出。1958年，合浦军分区在合浦举行民兵文艺会演时，合浦县代表团演出的耍花楼《赶会》，曾获优秀创作奖和演出优秀奖。1959年2月，北海人民公社文艺队曾带耍花楼《天仙颂东风》参加合浦县1959年春节文艺会演并获奖。该节目由吴光文、符云亭、温耀贵等人创作，由符云亭等五人表演。接着，该节目被选拔参加湛江专区1959年群众艺术会演也获奖。不久，又被选拔参加广东省1960年群众艺术会演。赴省会演后，1960年初，湛江专区文教局曾组织专区业余代表团带《天仙颂东风》等节目到茂名、湛江、北海、东兴等地巡回演出。1976年4月，合浦二中改编的耍花楼《送展品》，曾被钦州地区代表队带去参加广西区曲艺调演。1978年，钦州地区举行业余文艺会演时，合浦县代表队演出的耍花楼《赛歌路上》又获奖励。

客家木鱼

客家木鱼，流行于合浦、陆川、博白等县的村镇。在合浦县，主要流行于公馆、闸口、曲樟、白沙等乡镇说客家话的地区。当地人叫公馆木鱼或木耳。用客家话演唱。始于明朝，起源于乞丐串村行乞时的说唱，后来吸收当地民歌曲调，逐渐演变而成。

相传公馆木鱼源于樟木书房(廉湖书院)。书房中有对恩爱如鸳鸯的男女书生，女的叫牡丹花。一次，他们到合浦赴考，县官张五爷见牡丹花长得漂亮，欲霸为小老婆强抢入府，书生愤慨写下了木耳诗，发泄对黑暗世道的不满，后来乞丐以其诗谱曲来演唱，遂形成公馆木鱼。

建国前，公馆木鱼反映的内容多以男女爱情为题材，歌颂男女纯真的爱情及对封建婚姻的抗争。建国后编演的公馆木鱼，多以反映农村生活为主。1973年，合浦县文艺宣传队曾编演了公馆木鱼《探亲路上》，反映七十年代农村的好景象。1976年，合浦县文艺代表队曾在钦州地区曲艺调演大会演出公馆木鱼《山凤展翅》(由杨颂仁编剧、陈卫华、钟玲主演)，被评为优秀节目。同年4月，该节目还参加了广西区曲艺调演。1981年，合浦县文艺队在钦州地区业余文艺会演中，曾演出公馆木鱼《闹新房》，获创作奖和演出奖，该节目还被刊于钦州地区演唱资料中。

1982年，由公馆文化站廖纬朝编词、杨永平作曲的公馆木鱼《小李赴会》，

参加 1982 年合浦县业余文艺会演获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还参加钦州地区 1983 年元旦在浦北县举行的文艺调演。该作品曾发表于钦州地区群众艺术馆编的《演唱》第一期刊物中。

粤曲弹唱

珠乡的粤曲弹唱活动形成于何时，史籍上没有记载。按道理，应形成于有粤剧班演出之前。先有粤曲弹唱，后有粤剧演出。据合浦县志办周家干同志和珠乡作家李英敏著文，说粤剧于清康熙年间已由广东传人珠乡，有二百多年历史。据湖南戏曲家杨恩寿于清同治四年(1865)在北流做幕僚时写的《坦园日记·桂游日记》记载：“同治乙丑十一月廿四日……在廉州募广班来演戏三昼夜，凡三百余金，今夕始开台，演《六国封相》，闻出场者将及百人，其热闹不减梧州。”“廉州广班”就是廉州的粤剧班。由此看来，在清同治四年(1865)，粤剧在合浦已很流行，并有相当的规模。珠乡的粤曲弹唱活动肯定在清同治之前已有之。

据清末王传缙的《北海杂咏》诗云：“北海年来路线通，车如流水马如龙……宜仙楼上新翻曲，声调随他商变宫。”由此可见，清末北海的茶楼酒家宜仙楼(在沙脊街)已有曲艺艺人卖唱。

粤曲弹唱以娱人为主，一般自弹自唱，或三几个人组合演唱。在乐器的伴奏下，有坐唱、立唱或对唱的形式。演唱的地方有在街坊的、有在渔船的、有在茶楼酒馆的。演奏的曲调主要有二黄、梆子、牌子曲等。曲目大多是粤剧片断或广东音乐。

快板类曲种

快板类曲种，包括快板、顺口溜、对口词、天津快板、三句半等曲种。它由一两个演员韵诵或对说。有些曲种有竹板、节子板或二胡等乐器伴奏。

这种曲种何时传人珠乡，尚未找到文献记载。据老艺人说，顺口溜这种口头文学，很早就有了。老杨公就有顺口溜的演唱成份。至于快板、对口词、天津快板、三句半等曲种，多见于建国后，是由外地传人的。快板类曲种短小精悍、简单易学、生动活泼、战斗性强，演唱时不受时间、地点、场地的限制，所以，历来被利用配合政治中心宣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各地文艺宣传队及农村俱乐部多用快板类曲种配合土改、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发展生产以及大

跃进等运动而开展宣传。六十年代，快板类曲种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都建起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大多采用这种短小精悍的演唱形式来宣传。七十年代，尤其在农村电影队的映前宣传中，这种形式演唱得到广泛采用。八十年代以后，这种宣传形式随着电视录像等文艺新形式的普及而趋衰落。

建国以来，珠乡编演的快板类演唱材料，大都比其他曲种丰富、繁多、也留下很多优秀作品。如土改时，北海白虎头村陈万忠，控诉国民党保安队中队长黄光球时编的“顺口溜”《祸害百民》，就很形象生动。1960年9月，为配合开荒扩种及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合浦县委干部余其业编的快板《坚决贯彻县委指示》（刊于1960年9月《合浦演唱》42期）就很紧密配合中心。1965年春节，北海市职工文艺代表队参加湛江专区职工文艺会演时，曾演出快板《振亮叔翻身乐》，也很受群众欢迎。同年，北海市业余文工团演出的相声《女队长》、对口词《毛主席派来的好阿刘》、快板《夜半出诊》等节目，内容贴近生活，贴近民众，也深受欢迎。1972年，合浦县电影站宣传干事王德钦（王戈）编的快板《搞好计划生育》和天津快板《赞上洋冲口队春耕形势好》等节目，在农村映前幻灯演出、以及在合浦县幻灯会演中演出，皆受到赞赏和好评。1979年，为揭露越南侵略柬埔寨，染指我西沙群岛的罪行，王戈编的对口词《北极熊的爪牙》在农村宣传时也获好评，该节目还被刊于1979年9月出版的合浦《演唱资料》中。

说唱曲种

说唱曲种，表演时连说带唱，说说唱唱，或连说带舞。老杨公、耍花楼、公馆木鱼以及现代的小演唱、幻灯说唱、也都是说唱类曲种。说唱类曲种表演时生动活泼、形式多样。二十世纪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各地的文艺宣传队及农村放映队，多以这种文艺形式来唱中心、演中心和宣传中心，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这类作品。例如，1965年春节，北海市职工文艺代表队参加湛江专区职工文艺会演时，曾演出小演唱《目残志坚革命到底》，该节目热情歌颂现实生活中的好人好事。1972年，王戈编的说唱《热烈祝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胜利召开》，这个节目有说有唱，有锣鼓丝弦伴奏。该节目在合浦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的万人电影晚会上，利用映前幻灯演出，深受县委领导以及与会

代表的赞赏。1972年合浦县拥军编了个反映军民鱼水情的表演唱《找亲人》，有说有唱，也挺生动活泼。1979年，由合浦庞绍荣作词、余居贤作曲，用老杨公曲牌“划船调”作为主调的说唱节目《多话婆与陈三哥》，曾刊于1979年9月的合浦《演唱资料》中，也是一个贴近生活、反映农村生产队新的人际关系、宣扬民丰作风的好作品。

其他曲种

流传在珠乡的其他曲种还有龙州鼓、卖鸡调、莲花板、相声、太原大鼓等。这些曲种虽然不大常见，但在文艺刊物及城乡的文艺演唱中，也见之不少。例如1965年，北海市业余文工团曾演出过龙州鼓《美国佬吃铁西瓜》（反映美国佬侵越战争挨炸的事件），莲花快板《焦书记风雪探亲人》（歌颂焦裕禄爱民事迹）。1970年，符超群（原在合浦油厂、现在西场镇曲艺队）曾编了太原大鼓《歌唱老支书谭世华》（歌颂沙岗乡七星村老支部书记的先进事迹），该节目曾刊于1970年11月合浦文化馆编的《革命文艺》中。1973年3月，《合浦文艺》刊登了0624部队业余文艺创作组编的相声《战友》。1981年5月，《北海文化》曾刊登柳龙（梁禹）编的卖鸡调《婚事新办》。1982年，由邓宏德、温华熙合编的渔鼓演唱《高山长青、绿水常流》，曾获由广西日报等八个单位联合举办的“节约储蓄演唱材料”征文优秀作品奖。

说 书

说书，又称讲故事或讲古仔，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通俗文艺形式。它具有不用化妆、不用舞台道具、短小精悍、灵活简便、最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特点，较之其他文艺形式容易开展。

珠乡的说书活动，源于何年，在史籍上难以找到。据八十多岁的老艺人说，民国期间较有名的说书人有咸鱼包和广州佬。

咸鱼包，据说是合浦乾体人，姓包，有时贩咸鱼卖，故得名。于民国四年（1915）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他常在北海，合浦两地讲故事，在北海，他常于晚上在社王公“东宁社”（今和平路与中山中路西侧交界处）的三角平台讲故事。在合浦，他常在上新桥头摆档说书。所讲的书目都是传统的文学名著，有《三国演义》、《岳飞传》、《杨家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东周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济公》、《七剑十三侠》等。据说，听

故事的一般都有一百左右人，但每当他要听众捐点口舌钱时，大多听众都走散了。因而，市民常有“咸鱼包、讲腮(土语、无用之意)话”之说。

1945年至1947年间，有位广州佬，也常在“东宁社”三角平台摆档讲故事，并以此作为谋生糊口的手段。他常说的书目有：《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等。抗战后，较好的说书人还有黄裕才(吴川人，擅长说《三国演义》)和杨盛广(顺德人、擅长说《水浒传》)。

建国后，从1954年至1966年，北海文化馆、北海工人文化宫都先后组织讲故事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文娱活动形式不多，故事会还是很受欢迎的。如1959年，据不完全统计，北海文化系统组织讲述有关革命斗争和古今文学名著的故事会有38次，听众达19,000人次。北海文化馆，一般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三晚举办故事会，每晚一个半至两个钟头的时间，有时还张贴街招广告。听故事的往往有二三百人之多，被聘请的说书人都是业余兼职的。

在北海曲艺坛率先讲现代革命故事的，是青年教师罗定汉。1958年，他应聘在北海市工人文化宫讲革命斗争故事，曾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董存瑞》、《邱少云》、《罗盛教》、《江姐》、《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红岩》等现代书目。他讲《红岩》时委婉动听，最为生动。除讲革命故事外，他还讲一些传统书目，如《西游记》、《聊斋》、《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除了在文化馆、工人文化宫讲外，他还应邀到工厂、学校、农村去讲故事。讲故事前，罗定汉首先将这些名著领会吃透，然后再编说书话本，所以，讲故事前的准备工作，其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可惜，这一大堆改编的说书话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怕受文艺黑线的军连而烧毁了。

除罗定汉外，在文化馆、工人文化宫应聘讲故事的，还有方昆(讲《济公》最好)，陈洲(北海中学)、廖元勋(三小、讲儿童故事最好)，马云川(演出公司)、邹裕安(三小)、陈冠中(教育局)等一人。讲故事最为生动引人的，公认首推罗定汉和陈冠中。他俩说书，在介绍故事的来龙去脉、地点环境、刻画人物、摹拟人物对话、剖析人物心理活动等方面，始终说得明白生动，头头是道，有声有色，引人入胜，听众甚多。

1970年至1980年，市工人文化宫在周末都举办故事会，大多由陈冠中等人主讲。

1980年，根据广西区公社文化站经验交流座谈会关于抓好业余文化活动骨干培训工作的精神，北海市文化馆曾举办了五期故事员培训班，组织各公社、大队、中小学校、工交、财贸、农林水等战线及单位的业余故事员200多人，分期分批学习业务知识，提高故事员的讲述水平，从而使基层开展的故事活动更吸引听众、赢得听众。

1981年至1990年，由于对外开放后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化，致使城乡的故事活动日臻冷落。但是，讲故事这种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并未泯灭，而是从曲艺坛跃上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如1990年、北海广播电台播出了由陈琼播讲的《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长篇连播的传统书目，也很受群众的欢迎。群众只要在家中按时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便很舒服地收听收看到有声有色的故事播讲。